

易熙吾与民国《桂林市年鉴》 编纂述论

陈郑云*

摘要 抗日战争胜利后,易熙吾担任桂林市修志馆总纂暨桂林市文献委员会主任委员,面对战后社会经济凋敝及“文籍安牍,毁灭殆尽”的困局,在年鉴编纂热潮的影响下,从为市志编纂储备材料的视角出发,开创性地编纂出版了桂林历史上第一部综合年鉴——民国《桂林市年鉴》。全书框架结构清晰,内容丰富,将其现实考量与年鉴编写融为一体,在叙述中努力探索要素间的连贯性,叙事详今而不略古,为地方综合年鉴的创新提供历史经验。

关键词 易熙吾 《桂林市年鉴》 年鉴编纂 年鉴理论

易熙吾(1887—1969),广西桂林市灵川县人。清宣统二年(1910)毕业于北京高等实业学堂,曾参加同盟会。回广西后,历任广西勤工陈列所所长、广西省教育总会副会长。民国元年(1912),任广西大学堂预科班数理教师兼《民报》主编。民国4年(1915),参加内务部举办的县知事考试被录取后,历任广西绥淦县(今扶绥县)、钟山县及山西省沁源县、霍县等县知事和广西省省长陈炳珉秘书。民国17年(1928)起在桂林桂山中学任教六年,后在家闲居。民国35年(1946)出任桂林市修志馆总编纂,修志馆改为文献委员会后继任主任委员。民国37年(1948)兼任广西大学教授,1950年任校专职教授,1953年调广西文史研究馆工作。著有《易熙吾文存》《常用字源》《简化字原》《文字改革论集》《易熙吾研究报告集》《桂林话普通话对应规律》等。

易熙吾在担任桂林市修志馆总编纂、桂林市文献委员会主任委员期间,一方面主持创办《桂林市修志馆期刊》及《桂林市文献委员会刊》,为学术研讨搭建交流平台;另一方面着手编纂出版综合性年鉴——《桂林市年鉴》。《桂林市年鉴》作为“在国内省辖市县中能出版年鉴者,尚不多见”的情况下,^①由官方编修的一部综合性年鉴,具有较强的代表性。

* 陈郑云,男,甘肃省陇南市人,淮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讲师,历史学博士,主要研究方向为方志学、年鉴学。

① 苏新民:《序一》,易熙吾主编:《桂林市年鉴(1949)》,桂林市文献委员会,1949年,第1页。

目前学界关于民国年鉴的个案研究主要有两类:第一,综合性年鉴研究。孙兴武、徐佳佳分别对《申报年鉴》进行研究,认为《申报年鉴》编纂中遵循开放性与时代性原则,保持谨慎仔细的态度,时刻以读者为中心的理念,形成了一套完整有效的商业化出版发行机制。^①刘善泳通过比较分析《上海年鉴(1852)》和《上海市年鉴(1935)》指出,前者是传承西方历书传统的“历书系”年鉴,后者是承袭中国资鉴传统的史志系年鉴。^②张建明从分析《上海市年鉴(1935)》框架结构入手,提出“创刊号”年鉴和地方综合年鉴的纲目设计和编纂方法的异同。^③王继杰指出,中国大陆第一部城市年鉴——《上海年鉴(1854)》发现、整理的过程,表明了其融原文影印与专题研究相结合的西文地方文献整理的特点。^④第二,专业性年鉴研究。李子明认为,民国《铁道年鉴》既呈现当时年鉴发展的时代特征,同时也具有鲜明的铁路特色。^⑤徐佳佳分别就民国《中国经济年鉴》《实用国民年鉴》《儿童年鉴》展开讨论,认为这三种年鉴框架结构完整、层次清晰、内容丰富、善用统计图表等体例,编纂中根据社会环境以及读者的需求,进行内容、体例的创新。^⑥吴宏岐、何俊宇认为,1943年出版的《广州湾商业指南年鉴合辑》是城市指南与商业年鉴的结合体。^⑦

通过对以上民国年鉴研究状况的梳理可以看出,学界对专题性年鉴关注较多,对综合性年鉴除集中述评《上海市年鉴》等个别年鉴外,其余市县综合性年鉴鲜有关注。有鉴于此,笔者结合相关资料,冀望通过对民国《桂林市年鉴》的分析,进一步了解民国市县综合年鉴编纂出版和本土化过程,为当前综合性年鉴的发展提供历史经验。

一、易熙吾的方志与年鉴异同论

民国35年(1946)11月,桂林市修志馆成立,易熙吾出任总编纂。他克服抗战后社会经济凋敝及“文籍安牒,毁灭殆尽”的困境,“着手修志,拟定凡例纲目,征集调查资料”。^⑧同时,创办《桂林市修志馆期刊》,针对“方志”与“年鉴”的性质与功用、纂修方法、纲目拟订、材料搜集等问题发表比较系统的论述,形成自己独特的编纂思想。

-
- ① 孙兴武:《试析〈申报年鉴〉(1933—1936)的影响》,《中国年鉴研究》2019年第2期;徐佳佳:《〈申报年鉴〉编辑出版研究》,《上海地方志》2021年第2期。
- ② 刘善泳:《地方综合年鉴的基因谱系——以〈上海年鉴(1852)〉和〈上海市年鉴(1935)〉为例》,《中国年鉴研究》2020年第2期。
- ③ 张建明:《杂议民〈上海市年鉴〉创刊号的框架结构》,《上海地方志》2016年第2期。
- ④ 王继杰:《地方史料价值的认识与研究——〈上海年鉴(1854)〉整理与研究述要》,《中国年鉴研究》2017年第2期。
- ⑤ 李子明:《民国〈铁道年鉴〉编纂出版研究》,《中国年鉴研究》2019年第4期。
- ⑥ 徐佳佳:《民国〈中国经济年鉴〉编辑运营及启示》,《广西地方志》2021年第2期;徐佳佳:《〈实用国民年鉴〉编辑出版研究》,《黑龙江史志》2021年第7期;徐佳佳:《民国〈儿童年鉴〉的内容、特点及其启示》,《广西地方志》2022年第1期。
- ⑦ 吴宏岐、何俊宇:《〈广州湾商业指南年鉴合辑〉及其史料价值》,《中国年鉴研究》2021年第3期。
- ⑧ 易熙吾主编:《桂林市年鉴(1949)》,“弁言”,桂林市文献委员会,1949年,第5页。

针对民国18年(1929),蒋梦麟在浙江省政府会议提出“方志新体例”,分编《年鉴》《专门调查》《省史》三大纲,旨在“解散方志旧体”的提议,易熙吾发表题为《蒋梦麟之方志新体例》的专论,全面辨析方志与年鉴的异同。他认为,年鉴是方志资料长编,不可直接作为志书。因为“《年鉴》除第一回外,其余均应分年为之,每年一回,已载者不必年年重述,其材料不妨泛滥,愈详愈妙,愈近愈真,《年鉴》乃详尽之志材,不能即为志书也;如数年一回,或数十年一回,而兼载古今沿革,此即方志之体例,而非设《年鉴》之本意也”。而“志书为采集古今材料,再加去取剪裁,以成一篇可诵可参之文”。所以,《年鉴》是“志书之材料”,如果认为《年鉴》是志书,就“失志书致用之旨”。^①这里明确指出“年鉴”与“志书”的区别。其实,早在民国27年(1938年),黎锦熙在制定城固县续修县志工作方案时就论及“地方年鉴”说:“年鉴之体制颇卑,直昔日之‘类书’耳。然其功用绝大,今之一切学术研究与施政设教乃至经商企业皆资之。年鉴必发轫于地方,而后综合于全国,参加于世界,则繁简详略,皆能不失其正确性。例如,城固现在之物质状况、经济情形、人事习俗、社会组织、政治进展、人物分布,果能有精密之调查、详确之记载,再加以整理与统计,即成一部《城固年鉴》,而汉中区、陕西省、全中国以及全世界之年鉴,固将递为凭借,即准照所谓‘创’之目标以修《城固县志》,其‘长编’亦即此物矣。有此‘长编’,即县志之基已奠,只须益以沿革考证,而损其繁称琐录而已。年鉴之用,仍须存于方志之中,规制既陈,续修亦易,且可逐年添附,无烦重举也。”^②不言而喻,黎锦熙认为,年鉴是方志的资料长编,“只须益以沿革考证,而损其繁称琐录”,方志“续修亦易”。要而言之,从蒋梦麟提议分编《年鉴》,到黎锦熙指出“年鉴之用,须存于方志之中”,到易熙吾认为《年鉴》是“志书之材料”,伴随着民国时期年鉴编纂热潮的到来,学界对方志与年鉴异同的认识越来越清晰。

二、《桂林市年鉴》的编纂缘起与概况

第一,为市志编纂储备材料。民国36年(1947)5月,桂林市修志馆改为桂林市文献委员会,易熙吾继任主任委员。他指出,“内政部新颁办法,市志十五年一修,此合理之规定,自应遵从。桂林自民国二十九年设市,至四十四年方足限期,在此期内,努力征集调查志材,由最近以溯从前,其势较顺,时近迹真,地近易穷,治事从容,得以反复改正。惟最近趋势,认定年鉴为志书长编”。易熙吾援引上海市文献委员会主任胡朴安在编纂《上海市年鉴》时的观点“年鉴是修志的材料……按照通志体例,分别部居,通志即可修成,故欲修通志,年鉴必不可以不编辑”,强调“是年鉴确认为志材之一部,可知其重要性也”。^③显而易见,在编纂桂林市年鉴时,即明确了年鉴为修志的储备材料的重要任务。

第二,传承地方文化的需要。民国37年(1948)6月,桂林市市长苏新民指出:“年鉴为地方史料之一种,记载一年间一区域内各方面活动之状况,表彰文化,保存文献,备纂修

① 易熙吾:《蒋梦麟之方志新体例》,《桂林市修志馆期刊》1947年第2期。

② 黎锦熙:《方志今议》,《经世·战时特刊》1939年第47~48期合刊。

③ 易熙吾主编:《桂林市年鉴(1949)》,“弁言”,第5~6页。

志书之采择,供学术乡土之参考,其事业至关重要。戴东原曰:‘地方文献,及时不与搜罗,则他日将有放失难稽、湮没无闻者矣。’古人早就见及于此也。”^①在苏新民看来,年鉴是地方史料之一,编纂地方综合性年鉴,既可以“表彰文化,保存文献”,又可以“备纂修志书之采择”,还可以“供学术乡土之参考”。民国38年(1949)5月,桂林市市长梁家齐指出:“年鉴为地方史地之记载,辑而印行,本保存地方文献应有之政务,徒以在市县才财两缺之环境,未能随时举办,以后纂修市县志及学术参考,均无所依据,此实各市县政府无可奈何之事。今《桂林市年鉴》已勉可出版,其为欣兴,自无待言。但愿力所能及,第二次以后所编年鉴,仍盼可能出版,以赓续此伟大艰辛之事业,蕲于地方文化有所裨补,斯则私心所期望者也。”^②作为新任市长的梁家齐亦表示,年鉴是地方史地的重要记载,编纂出版年鉴是“保存地方文献应有之政务”,“于地方文化有所裨补”。不言而喻,在地方行政官员看来,编纂年鉴是地方文化得以传承和创新的重要事业。

第三,年鉴编纂热潮的影响。民国时期,中国已经开始自主出版本土年鉴,尤其是到20世纪30年代,伴随中国近代出版业的进步,中国人自主编纂出版的年鉴种类、数量都出现大幅增长,有人称为短暂的“年鉴热”,1930—1949年编纂出版了百余种年鉴。在年鉴种类和数量大幅增长的同时,社会各界对年鉴的认知不断深化,年鉴理论研究水平也不断提高。民国政府对年鉴的价值和作用就十分认可,如陶履谦在为民国政府内政部编纂的《内政年鉴(1935)》所作序言中说:“年鉴者,综合一年来行政状况,一一撮其大要,或列为图表,以供现代之研究,而备后来之取鉴者也。”^③张蕴和在所作《申报年鉴(1933)》序言中说:“年鉴者,即将此一年之所得,为之爬梳整理,以代各界人士于脑中记此不能记之事物,留此不能留之印象者也。”^④他们均十分肯定年鉴的作用。为此,民国政府出版了一批官修年鉴,如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经济研究室编纂的《全国银行年鉴》,民国政府财政部编纂的《财政年鉴》等,各地方政府也编纂出版了《上海市年鉴》《江苏年鉴》《湖北年鉴》《湖南年鉴》《无锡年鉴》《赣县年鉴》等。^⑤民国政府对年鉴的认可及前期编纂过程中积累的经验都为《桂林市年鉴(1949)》的编纂出版打下了基础,该年鉴“凡例”即云“题名录”类目的设置,是借鉴《上海市年鉴》的“名人录”类目的做法。可以说,民国时期年鉴事业大规模的发展为《桂林市年鉴(1949)》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,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。

民国36年(1947)5月,由易熙吾主导的桂林市文献委员会“遂决定编辑《桂林市年鉴》,办事定有目标,进行自较简易”。但是编纂过程“繁重艰辛,殊为不易”,因为“他处编印年鉴,组织委员会,工作达数十人”,而“桂林市文献委员会中职员专任采访编辑者仅有数人”。在易熙吾与全体采编人员的“奔走伏案,各就本位,努力工作,昕夕靡暇”情况下,

① 苏新民:《序一》,易熙吾主编:《桂林市年鉴(1949)》,第1页。

② 梁家齐:《序二》,易熙吾主编:《桂林市年鉴(1949)》,第3页。

③ 陶履谦:《序》,《内政年鉴(1935)》,商务印书馆,1936年,第1页。

④ 张蕴和:《序》,张梓生等主编:《申报年鉴(1933)》,美华书馆,1933年,第1页。

⑤ 肖东发:《年鉴学概论》,中国书籍出版社,1991年,第58~65页。

又加上“市府各科室及省内各机关团体之协助,供给材料,极为踊跃”,所以“数十万言之巨著,八阅月而告竣”。^① 所以,时任广西省主席黄旭初题词“市志先声”祝贺,广西省文献委员会副主任李任仁题词“桂林大观”祝贺。民国37年(1948)5月,桂林市市长苏新民“因于市款支绌中勉力筹拨印刷费,以助其成”,编就付印,“印工纸料各款,均已交清”,约定八月印竣。但是“中间因物价波动,印刷延误”。民国38年(1949)1月,梁家齐任桂林市市长后,“竭力督催”,又得广西省文献委员会副主任李任仁(李重毅)协助,至5月正式印竣出版。^②

三、《桂林市年鉴》的编纂特色

在近代市县综合性年鉴中,《桂林市年鉴》内容丰富、体例完整,质量可属上乘。在框架结构、体例和内容书写等方面,具有以下特征:

第一,框架结构设计清晰。框架设计缺少个性和特色,会导致地方综合年鉴框架结构的雷同化。以易熙吾为首的《桂林市年鉴》编纂,紧跟时代步伐,紧密结合桂林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,立足地情,强化理性思维,探索设计出个性鲜明的框架结构。全书采用二级纲目体编纂,依次设特载、土地与地政、户政与气象、行政与自治、财政与粮政及会计、金融、交通、教育、文化事业、社会事业、党团会社、保安与司法、农业与林业、工业与劳工、商业、宗教、桂林市第一次年鉴大事日记、桂林市名人录,共18个一级类目。各一级类目下分设二级子目,二级子目下视需要再设条目。如“教育”类目下分设桂林市教育概况、桂林市历年度各级学校办理学校社会教育工作报告、桂林市历年度国民教育概况、桂林市区各学校概况等9个子目,其中“桂林市区各学校概况”下再设国立广西大学、国立师范学院、国立汉民中学等21个条目。这种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分工设置纲目内容的架构,能够比较完整地反映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全貌,亦为今天的各类地方综合年鉴所沿用。

第二,内容丰富,特色鲜明。从叙事空间上看,《桂林市年鉴》将自身定位为了一本综合年鉴,其内容非常丰富,不仅关注桂林市发展,还从省会城市的视角出发记录广西省的有关的动态,未涉及的旅游文化方面内容,则“另编成一‘旅游专刊’专载风景、古迹、习俗、方言,与年鉴并行”^③。总体而言,《桂林市年鉴》所涵盖的内容十分详细,特色鲜明,不仅有大量的文献,还包括大量的数据表格。主要特色表现在:

一是突出时代特色。《桂林市年鉴(1949)》首列“特载”类目,分两部分记述桂林暨广西的重大事件。其中,“特载(一)”设计《中日战争结束 胜利到桂林》《桂林疏散特记》《桂林沦陷特记》《桂林光复特记》《省府市府复员》《中央大员金汉鼎来桂宣慰》《救济情形》《桂林新市政之设计与实施》等8个专篇,根据形势发展和时局的变化,审时度势,抓住中日战争、桂林疏散、桂林沦陷、桂林光复、新市政建设等具有时代气息的热点问题、社会热

① 苏新民:《序一》,易熙吾主编:《桂林市年鉴(1949)》,第1页。

② 梁家齐:《序二》,易熙吾主编:《桂林市年鉴(1949)》,第3页。

③ 易熙吾主编:《桂林市年鉴(1949)》,“凡例”,第2页。

门话题;“特载(二)”则从桂林实际出发,优化整合框架结构,设计《桂林为广西省会》《省政府记略》《省参议会》3个专篇,与时俱进地载录桂林作为省会城市以及省政府的情况。“特载”部分设计的11个专篇科学、合理地反映桂林暨广西具有时代特色的鲜活内容,使年鉴成为名副其实的“时代镜子”。

二是彰显地方特色。《桂林市年鉴(1949)》在编纂实践中从省会城市的视角出发设计框架与叙述内容,立足桂林,兼及广西,彰显地方特色。如“金融”类目下设桂林市银行、广西省银行、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银行、标会、金店、信托局、银行公会7个子目。其中“桂林市银行”下设简史、复业经过、组织系统、行员姓名、历年总决算、历年营业概况、股东会报告等7个条目。又如“商业”类目下设桂林市商业概况、市商会、广西省商会联合会、广西企业公司、特种矿产管理处、广西水电特种股份公司、保险7个子目。这样的设计与叙事抓住了“桂林市”中心,突出重点,彰显地方特色。由于桂林作为广西省会所处的区位不同,资源禀赋不同,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具有其特色,该年鉴的框架设计与叙述能够抓住这些与众不同的内容,精心设计出能够突出地方特色、记述发展轨迹的框架与内容,框架的个性就能显现出来,从文化底蕴中张扬地方人文特色。

三是灵活运用图表。《桂林市年鉴(1949)》灵活运用图、表体裁,开篇先列《桂林市图》,山川河流、地理方位一目了然,其余各类目广泛运用各类表格。既有同一对象不同年份的统计表,如《三年来趸售物价指数》《三十四、五、六年市岁入岁出分类表》《桂林市各年户口统计表》等;也有年度数据统计表,如《桂林市三十七年重估各区标准地价》等。主要针对一些类目数字较多、叙述繁杂的情况,编纂人员通过运用表格把数字有序地排列在一起,集中表述事物的发展变化情况,将繁杂的事物进行简化,使事物的条理更加分明、内容更加清晰,让读者一目了然,还节省了年鉴篇幅。同时,该年鉴使用的表格数据,除少部分直接引用自政府机构,大部分都是经由年鉴编辑二次加工编制的,如《桂林市区土地登记区段地号及面积统计表》《清理各级仓储损失现存统计表》《国民义务劳动统计表》,所列的表格内容就是编辑根据政府机构上报的材料重新编制的。挖掘文献的内在价值,实现了把资料条理化、完整化、系统化的编辑职责。值得一提的还有,年鉴编辑对来稿中的大量政府公文、法律条文、论文等一次文献也较少直接照搬,如通过设计《桂林市政府组织系统表》《各区公所组织及职员一览表》《各街村公所职员姓名一览表》等表格,对政府公文内容进行表格式优化处理,由此可见年鉴在材料的使用上更加严谨和高效。

四是重视人文记述。文化是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的灵魂。文化兴国运兴,文化强民族强。《桂林市年鉴(1949)》旨在“表彰文化,保存文献”,以“于地方文化有所裨补”为编纂出发点,^①在编纂实践中着意文化元素的载录,重视人文记述。如设置“桂林市题名录”,“在二十万人中题名者约千余人”,“以有名于仕,册簿书录得一名之荣者,及专门以上列学籍者等人为之”,主要收入“桂林市区户籍题名录”“桂林各机关题名录”“桂林各大学同学会题名录”“各书籍上之桂林人题名录”,这四个“题名录”中所载人物,“籍贯不论,限居

^① 梁家齐:《序二》,易熙吾主编:《桂林市年鉴(1949)》,第3页。

市区,本籍名人,出外亦记,惟以生存人为断,都有根据,亦一代文献也”。^①“文化事业”类目除载录文化事业概况、文化机构设置、文化活动外,专门设置桂林籍人之著述、桂林地区之著述、桂林书店3个子目,“可见地方文化程度之一斑”^②,最能体现一地的人文景象。重视人文内容的记述,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为社会发展提供服务,也是发挥年鉴教化功能的需要,将年鉴从普通记录历史,上升为既有史实记录,又有人文情怀的优质年鉴。

五是及时纠错、补阙。在地方志编纂中,续修志书中对前志纠错、补阙是一个优良传统。章学诚提出:“前志不当,后志改之,宜存互证也。”“如前志无憾,则但当续其所有,前志有阙,但当补其所无。”^③因此,方志中往往设有“刊误”“订正”“辨疑”等篇目,就是为了履行续修志书纠错、补阙的职责。《桂林市年鉴(1949)》编纂者自觉继承和发扬方志续修中纠错、补阙的优秀传统做法。由于当时印刷业基本处于“铅与火”的时代,主要印刷方式是凸版铅印与平版石印,加上编纂者、印刷者在排版、印制阶段对个别细节的忽略,出现了一些不可避免的小失误,导致印刷成品难以修改。有鉴于此,《桂林市年鉴(1949)》在最后专设“改正之页”,对年鉴编纂、排版、印刷中的错漏及时纠错、补阙。纠错就是对年鉴中的“硬伤”,包括数据、日期等错误,以及时间不一和校对失误等进行纠正;补阙,即对年鉴记述中缺漏的条目、事件、人物等缺项和虽有记述但资料不完善的条目补充。“改正之页”纠正日期错误1处、标题序号错误10处,补充排版中遗漏的“桂林市三十七年重估各区标准地价”“桂林市卅六年后气象水文统计表”小标题2处,补写漏载的“私立西南商业专业学校”资料1条。从纠错、补阙的内容上看,详细注明“页、栏、行、误、正、补”等项目,完整地囊括了年鉴中的错误的位置、排检和更正,这样只针对问题的纠错、补阙形式,让年鉴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,既保证了年鉴的质量,又不必浪费重印。从年鉴的价值角度考量,一部资料翔实、文字准确的年鉴,将会为社会、经济的发展提供科学的依据。正是出于这样一种敢于担当的意识,才促使编纂者认真查缺补漏,不断完善年鉴。

第三,文本编写严谨。《桂林市年鉴(1949)》在编纂中,将其现实考量与年鉴编写融为一体,在叙述中努力探索连贯性过程和各连贯性要素间的协同互动关系,能够为年鉴叙事提供新的文本书写视角和思路。

一是叙事文本的连贯性。时间是空间中的时间,空间是时间中的空间。时间与空间的关系在叙事文本中无法割裂。《桂林市年鉴(1949)》的叙事文本在连续的时空呈现中体现着连贯性的特点。以“户政与气象”类目为例,在记述“桂林户政概况”时,首先“以桂林建市的叙事起点”曰:“桂林市成立于民国二十九年,当时人口仅十余万。洎乎抗战失利,广州、武汉相继沦陷之后,各省人民纷集本市,至三十二年全市人口遂达四十余万之多,翌年倭寇南侵,本市失陷,市民彻底疏散”。其次,以“桂林光复为叙事节点”曰:“殆至三十四年秋光复之后,始陆续归来。但所有户籍册均已散失,乃重新调查户口,整编保甲,使凡居住市内之人悉归于村街编制之下,以健全基层组织,便利推行行政令,此项工作于

① 易熙吾主编:《桂林市年鉴(1949)》“桂林市题名录”,第476页。

② 易熙吾主编:《桂林市年鉴(1949)》,“凡例”,第2页。

③ 章学诚:《记与戴东原论修志》,《章学诚遗书》,文物出版社,1985年,第939、885页。

三十四年九月开始,同年底完成”。最后,以“桂林户籍整理为叙事终点”曰:“三十五年十月,为确切了解本市区之户籍人事动态,期达甲无漏户、户无漏丁之目的,复由市政府通飭所处各区整理户籍,以一月为限,举办结果均能把握重点,依期完成工作,一年以来,本市人口计十三万有奇,不及疏散前三分之一,仅相当于初设市时之人口数。兹记桂林市政府户政室工作大略情形,以见户政之一斑”。^① 通过阅读编纂对“桂林户政”工作的叙述,时代的窗口和空间的切片,在年鉴叙事的文本世界中串联起具备连贯性的轴线,推动着户籍工作的发展和叙事的连贯性升华。

二是叙事详今而不略古。年鉴以其及时的特点着重记述一年的事项,《桂林市年鉴(1949)》在编纂过程中将“年鉴作为志书长编”,搜集资料时无论古今资料尽量搜集齐全,注重历史沿革,叙事详今而不略古,力求经得起时间的考验。如“土地与地政”类目记述“桂林区域沿革”开篇曰:“古称中国东南疆外地曰百越,约计包括今之两广及闽浙安南一部之地。秦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为三十六郡,桂林地区未见在内。然桂林在百越与否,亦属模糊。卅年,始皇派尉屠睢略取陆梁地,设置桂林、象、南海三郡,戍守五岭,其第二岭名始安,又名越城,(今越城距桂林一百余华里),始安即今桂林市。”^② 这里从秦代桂林区域沿革开始,一直叙述到民国29年设立桂林市,再到民国31年桂林市行政区划调整定型。由此可见,编辑秉持详今而不略古的书写原则,在搜集资料时无论古今资料尽量搜集齐全,用严肃的态度,审慎地对待资料,把历史上发生的事件尽可能弄个明白,弄清事物的发端、发展和变化。

四、在年鉴发展史上的地位与影响

民国《桂林市年鉴(1949)》的编纂,得益于易熙吾主导下桂林市文献委员会的组织领导、组稿编纂和严格要求,成书出版后的年鉴结构清晰、内容丰富、资料翔实。然而,民国时期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领域皆处于大变动、大变革时期,年鉴在从西方传入中国,不断适应中国国情的编纂发展过程中,其年鉴理论与编纂实践的探索与调适道路注定是漫长、曲折与艰辛的。

民国《桂林市年鉴(1949)》虽然名为年鉴,但属首创之作,实际上更像一部“资料长编”。从编纂结构上看,逻辑不够严谨,层次划分不一,“特载”部分有新闻报道痕迹;从断限上看,其“凡例”明确叙事时间自民国34年8月1日“桂林市光复”至36年12月底,上下限近两年半,又突破下限强调“惟三十七年‘重估地价表’太关重要,特为补入”^③,使年鉴最重要的年度特色不具有年度性。该年鉴作为省会城市综合年鉴编纂的有益尝试,或许就是年鉴在不断适应中国国情的探索期间曲折艰辛的一种表现。虽然未能实现年鉴的连续性编纂,但是综观全书,对年鉴资料权威、反应及时、服务社会等年鉴特征的追求始终

^① 易熙吾主编:《桂林市年鉴(1949)》“户政与气象”,第108页。

^② 易熙吾主编:《桂林市年鉴(1949)》“土地与地政”,第76页。

^③ 易熙吾主编:《桂林市年鉴(1949)》,“凡例”,第11页。

贯穿编纂全过程,体现了早期年鉴编纂者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。

由于时局所限,在易熙吾的主导下,桂林市文献委员会只能完成桂林建市以来第一次《桂林市年鉴》的编纂出版工作,未能实现易熙吾提倡“自应继续出版”“以备修市志之取材”的夙愿,^①致使我们无法窥其连续性与创新性,但这丝毫无损于其在年鉴发展史上的地位。

一是开创了桂林历史上综合性年鉴编纂的先河。年鉴虽源于西方,但在传入史学发达的中国后迅速落地生根。据《民国时期总书目》统计,1911—1949年间全国各地编纂各类年鉴280余种,然而市县综合年鉴仅有《上海市年鉴》《广州年鉴》《无锡年鉴》《赣县年鉴》等10余种。^②因此,民国《桂林市年鉴》作为官方编修的一部综合性年鉴,可以说开创了桂林历史上综合性年鉴编纂的先河,也为市县年鉴的编纂树立了典范,具有较强的代表性。

二是探索了年鉴学的理论与方法。易熙吾作为年鉴的总纂,以编修组织制度的完善,保证编纂工作的正常开展,从“年鉴是方志资料长编”的编纂理念出发探索年鉴的框架结构,并通过“序言”“凡例”阐发年鉴理论的内涵与价值。基于编纂理论与实践思考,他提出“年鉴除第一回外,其余均应分年为之”“自应继续出版”“以备修市志之取材”的志鉴编修理念,^③既有利于地方志编修,对当今年鉴编纂也具有指导意义。

需要指出的是,以易熙吾为代表的年鉴编纂人对年鉴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经验,在后世得到很好的传承与创新。1986年,中共桂林市委、桂林市政府决定编纂《桂林年鉴》,“以一届市委和市政府任期为时限,每五年编纂出版一卷”,由桂林市地方史志总编辑室负责实施。^④到1993年,桂林市第一部“以一届市委和市政府任期为时限”的综合性年鉴——《桂林市年鉴(1986—1990)》由漓江出版社正式出版。全书采用类目、分目、条目的三层次编辑法,基本内容分特载、专文、大事记、史地概述、政治、政法、军事、社会生活、经济综合管理、城市建设、工业·交通·邮电、农业·外事·旅游、商业、工商行政·物价·物资、外经贸·海关、财政·税务、金融·保险、科学技术、教育、文化事业、卫生、体育、文物古迹、山水风光、县区概况、人物、企业选介、附录,共30个一级类目,类目以下设若干分目,分目以下设若干条目。^⑤

如果将《桂林市年鉴(1986—1990)》与民国《桂林市年鉴(1949)》作比较,两种年鉴的框架结构,除因为客观上行业分工更细、党政部门设置更为繁复等客观原因导致条目数量增加较大之外,其他如“特载”“大事记”“文化事业”“教育”“商业”“农业”等非部门性条目基本得到沿袭,只是有些名称稍有变化。浏览全书可以发现,其分目、条目的设置完全相类于前者自成体系的框架结构,文本记述则完全相通于前者突出的记录(记述)特点。

① 易熙吾主编:《桂林市年鉴(1949)》,“弁言”,第6页。

② 据北京图书馆编《民国时期总书目(1919—1949)》(北京图书馆出版社,1994年)统计。

③ 易熙吾主编:《桂林市年鉴(1949)》,“弁言”,第6页。

④ 桂林市年鉴编纂委员会编:《桂林市年鉴(1986—1990)》“编辑说明”,漓江出版社,第2页。

⑤ 桂林市年鉴编纂委员会编:《桂林市年鉴(1986—1990)》“编辑说明”,1993年,第2页。

至于以特定年度为记述时限、以特定地域(桂林)为记述对象的特点,更无须赘比。分析《桂林市年鉴(1949)》的编纂特色,辨明它与《桂林市年鉴(1986—1990)》的继承与创新关系,对于认识地方综合年鉴若干理论和实践问题具有启发价值。

追溯源起不难发现,1986年桂林市创刊综合性年鉴时,自觉选择了在继承中创新年鉴编纂的优良做法,既以先出年鉴为参考,又以修志经验为基础,以质量提升为导向,保持着结构、框架、文风等方面的基本稳定。1997年以后,《桂林年鉴》每年出版一卷,实现了年鉴的年度性和连续性。经过三十余年的探索与创新,如今的《桂林年鉴》已成为各级领导机关决策、指导工作的市情依据,也是社会各界和海外人士了解、研究桂林的信息载体,并为桂林市的发展积累了重要史料。伴随着时代的进步,近年新出版年鉴配备双重检索系统,书首设置中文、英文目录,书尾编制索引,配备随书光盘以及光盘内含电子版年鉴,采用先进的多媒体和全文检索技术,实现内容到形式上的不断创新,既增强了年鉴的工具实用性,也体现了年鉴发展与与时俱进的时代性。

结 语

综上所述,易熙吾作为桂林市修志馆总纂、桂林市文献委员会主任委员,面对战后社会经济凋敝及“文籍安牍,毁灭殆尽”的困难局面,在年鉴编纂热潮的影响下,从为市志编纂储备材料的视角出发,开创性地编纂出版了桂林历史上第一部综合年鉴——民国《桂林市年鉴(1949)》。全书框架结构清晰,内容丰富,将其现实考量与年鉴编写融为一体,在叙述中努力探索要素间的连贯性,叙事详今而不略古,为地方综合年鉴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历史经验。而考察易熙吾主持编纂年鉴的全过程,探索易熙吾为编纂桂林文献作出的努力与贡献,进而勾勒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思考志鉴编修的历史脉络,可以揭示易熙吾与桂林志鉴文化形成的关系及其重要贡献。

责任编辑:朱 海